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草婴译 《安娜·卡列尼娜》 译林出版社

非人间的东西

□张怡微

上海音乐剧演出市场的繁荣，给了我许多重读文学经典的机会。上个月因为工作繁忙，我推掉了《战争与和平》的重读活动，但这个月紧接着《安娜·卡列尼娜》上演，我猜想可能是天意的邀约：一则来自文学大师托尔斯泰的天意。这两年，重读托尔斯泰是一项具有深意的全球民间阅读活动。2020年3月18日，来自全球各地的近3000位读者进入小说家、普林斯顿大学创意写作教授李翎云的线上共读空间，开启了一场阅读马拉松：在为期85天的共读活动中，一起阅读托尔斯泰的巨著《战争与和平》，每天15页，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交流读后感。这场公众阅读的成果——《托尔斯泰为伴：与李翎云共读〈战争与和平〉的八十五天》中文版，已于年初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在一些年轻人录制的播客中，听到他们也以手机群组的形式参与到编外的阅读活动中。他们的想法很诚实：如果在这段特殊的居家日子都没有勇气打开托尔斯泰的话，那这辈子都不会再充分的时间阅读他了。

《安娜·卡列尼娜》的小说结构较为简明，故事从名句“所有的幸福家庭都是相似的，而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幸”开始。最先出场的家庭是安娜的哥哥奥勃朗斯基，因为出轨家庭女教师，他让妻子陀丽伤了心。这家的整体状况看起来并不好，经济上时不时拮据。奥勃朗斯基发自内心的对妻子丧失爱意，因为妻子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性魅力，可即使如此，两人却一直在忙着生孩子。出轨事件，让奥勃朗斯基感到厌烦，一方面是对道歉厌烦，一方面也是对自己的处境感到疲惫。两夫妻正在冷战，而讨人喜欢的安娜很快要到来。陀丽并没有离婚的底气，却又对丈夫有怨气，与此同时，她还是期待安娜来临，因为家中的孩子们都喜欢安娜，陀丽自己也需要安娜的出现帮助她来找到台阶、缓解夫妻间冰冷的关系。小说本该转移到安娜的视角，作家却笔锋一转，紧接着交代起小说另一条重要的副线，即奥勃朗斯基的少年伙伴列文。列文是一个贵族单身汉，掌握农场的运营。尽管对婚姻充满怀疑，他还是想要寻找一个妻子，也因此遭遇一场由初恋引发的创痛。列文爱上了陀丽的妹妹、公爵家的小女儿吉蒂，而吉蒂那时被家人怂恿暗恋起浪漫的符朗斯基，也就是后来安娜的情夫。这段四角恋情，因为夹杂着安娜和符朗斯基不伦的情愫，传递打乱了列文和吉蒂的情感节奏，两人各自经历一番折磨后，才终于结合成婚姻。另一边，则是安娜和符朗斯基惊悚骇俗的绯闻，最终将安娜拖入社交场和命运的绝境。从小说篇幅来说，大部分叙事并不是围绕安娜而是围绕着列文的精神生活展开的，列文思索的许多问题，都有托尔斯泰本人意见的投射。小说中详述三个家庭和三种生活形态的编织过程，形成了《安娜·卡列尼娜》立体的文学结构。

安娜线的故事如此清晰：她从火车站听闻有人卧轨，符朗斯基出了一份捐款，令安娜莫名感到生理不适。舞会中吉蒂等待符朗斯基求婚却遭遇安娜出现。符朗斯基赛马中摔下马让安娜大惊失色、卡列宁十分不满。安娜离开卡列宁与符朗斯基出走意大利。安娜偷偷回来将儿子被驱逐。最后安娜心灰意冷，葬身车轮……这些情节令人印象深刻，也是电影、电视、舞台剧、音乐剧中乐于展现的段落。那么小说为什么还要写其他的部分呢？

2021年，王安忆有一篇文章《贵族——以〈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为例》回答了这个问题，为我们阅读托尔斯泰做了不少识别工作。有时文学观察，在这样的时刻才有意思。例如王安忆提到安娜和符朗斯基私奔到意大利时期的一些小事，一段是他们的交友，仅有一位自由派和一位不得志的画家，为安娜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很重要，后来列文甚至因这幅画精神出轨，让吉蒂十分不悦。托尔斯泰借由安娜之眼，看到了吉蒂曾爱慕列文和符朗斯基的共同点。那是一种永远不说破的情敌默契，其实列文同样经历了一番类似的难言之隐。王安忆指出，那段时期，表明了安娜和符朗斯基社会处境的边缘化。安娜在意大利营建的“小宫廷”是多么脆弱，只需借用列文庄园的马车夫的抱怨“主人只给了三斗燕麦喂马”，就揭露了窘迫。在文章里，王安忆巨细靡遗地介绍安娜身边残存的交往人群边缘的格局。有一刹那让我想到了《长恨歌》中的平安里。在濒临死亡符号“40(年)”的平安里39号，居住着旧时代的遗民，用小说里的话，平安里那些人都是跟不上新时代的“散兵游勇”。王琦瑶用酒精灯点燃的温馨“小天地”，在那里打牌跳舞吃下午茶，又何尝不是安娜脆弱的“小宫廷”，一句不经意的话就能点破真相。那种幻象，协同人的意识所营造的全部“非人间的东西”，便是“文学”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失败救赎。



〔英〕E.F.舒马赫著 刘清山译 《小的是美好的》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小一点，就从容一点

□陆远

1912年4月10日上午11点，当泰坦尼克号开始首次航行时，它是这个地球上体积最大的可移动人造物体。讽刺的是，仅仅过了4天，这艘号称“永不沉没”的庞然大物就因为与冰山相撞而被迅速摧毁——从碰撞发生到轮船沉没，为时不到3个小时。与极尽奢华的船体一起被刺骨的海水带走的，还有超过1500个鲜活的生命。

泰坦尼克号事件是人类在和平时期伤亡最为惨重的一次海难，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一个巨大的隐喻。在那以前，人们通常自负地以为，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就是人类征服自然无往而不利，泰坦尼克号就是工业时代巨大成就和美好梦想达到顶峰时的产物，象征着人类掌控自然所能达到的尺度。直到它启航那天为止，西方世界已经享受了超过一个世纪的安稳太平，对于“更大”“更高”“更多”“更快”的未来，人们充满信心。巨轮的沉没仿佛一记重拳，让人类看到自身在自然面前的微不足道，看到为傲慢的自信付出的致命代价，也让人们开始质疑工业文明的种种弊端。

到了20世纪70年代，对欧美发达国家那种以大规模工业化为中心发展理念的批判，达到工业革命以来的高潮。1973年，德裔英籍经济学家舒马赫旗帜鲜明地指出，“以大为美”，“忘乎所以”地追求对自然的绝对掌控，是一种“荒谬的，自取灭亡的”错误，“现代人没有意识到自己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他感到自己命定是支配和征服自然的一种外来力量。他甚至谈到要向自然开战，却忘记了，设若他赢得了这场战争，他自己也将处于战败的一方”。50年过去了，舒马赫的语言犹在耳。他的这本小册子《小的是美好的》犹如清夜鸣钟，也一再被人论及，成为深度反思现代化及其弊病的畅销书。

舒马赫开宗明义地强调，当下这个由现代技术塑造的世界，正面临一场重大危机：作为现代工业运转基础的非再生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走向枯竭，这意味着维持人类生命的地球环境正遭到根本破坏。更加最重要的是，“非人性的技术、组织和政治形式”不断侵蚀长久以来宁静平和的人类精神世界。在舒马赫看来，作为我们星球上唯一的智慧生物，人类最大的乐趣与幸福来源是创造性地、富有成效地使用他们的双手和大脑。而“非人性的现代技术”剥夺了这一切，它使得流水线上“没有生命的产品”变得日益精巧，却让人类自身日益变质退化，像《摩登时代》里卓别林饰演查理那样，成为流水线上一枚失去个性与活力的六角螺帽。此外，以物质追求作为生活的唯一目标，以经济或不经济作为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准，必然引起人类在精神上的贪婪、仇恨、嫉妒和欲望上的暴力。舒马赫将上述种种问题总结为“一套掠夺自然界的生产体制”和“一种肢解人类本身的社会模式”，他告诫我们，当下人类的首要任务，是“摆脱现在的互撞轨道”，寻求一种以人为本、循序渐进、互惠互利的新社会方案。

人类社会的发展危机及其解决之道，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社会科学界的核心议题。在舒马赫之前，罗马俱乐部长期致力于“人类困境”的系统模型分析，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直被视为人类思考发展模式的启蒙作品和世界可持续发展进程中的绿色经典。在舒马赫之后，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对“第三次浪潮”热情拥抱，就是建立在对“第二次浪潮”“狂热好大”的审思与批判基础上。这些成果的价值，不在于预测人类前景，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对于人类面临威胁和未来机遇的探讨与思考。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小的是美好的》就被译介到中国，迄今已有至少三个中文译本。长期以来，对这本书给予关注的中国读者主要来自经济学界。舒马赫所谓的“小”，也往往被从产业结构、企业规模、能源消耗等方面加以解读。事实上，作为20世纪重要的思想家，舒马赫从众多人文化传统那里获得滋养：威廉·莫里斯、克鲁泡特金、甘地、刘易斯·芒福德、加尔布雷思……但凡有所教益，皆为舒马赫兼收并蓄融入他的思想炼丹炉，他甚至专辟一章谈东方宗教对西方经济学的启示。舒马赫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人类生存的根本意义。在他看来，任何技术、策略、方针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人类能够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实实在在的福祉。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他强调科学技术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它们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一种潜力”，就像钢琴不是音乐一样，科学技术本身也并非“文化”，能否完成这个“没有完成的句子”，使潜力变成造福社会的现实，要看人类的智慧能否战胜我们一贯的短视。用学者梁小民的话说，舒马赫的价值，就在于他“把人当回事”。

崩人快语



〔美〕普鸣著 张常焯、李健芸译 《成神》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自性成神

□蒯乐昊

普鸣(Michael Puett)，美国汉学界重要人物，以辩才闻名，据说他的课广受受欢迎，他在哈佛的通识教育课程“经典华夏伦理与政治(Classical Chinese Eth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一直是哈佛本科生选课数量榜的前三名，能容纳800人的Sanders Theatre常为之水泄不通。普鸣的学术作品《成神》，英文版面世在千禧年前后，但待译介入中国，已是二十年过去了。

《成神》一书是普鸣在人类学、历史学和哲学三个不同学科长期研究兴趣的结果，事实上，他的三个学位也来自这三个领域(历史学与哲学学士，芝加哥大学人类学硕士、博士)，但他没有提及的是，长期在这三个学科交界处游走，让他同时对宗教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在哈佛大学，他还长期担任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

当我们回望中国轴心时代的文明，也许，一个外来者的眼光，会提供完全不同的参照系——他致力于将中国研究纳入更大的历史和比较框架，尤其是早期中国历史(约公元前1200年-公元前755年)中的礼仪、社会与政治理论。在普鸣眼中，中国古代先哲试图把宇宙描绘成一个自然发生、自我生成的系统，在一片混沌之中，自然地分化成了天空和大地，阴阳双生之气运行，万物得以赋型。这显然迥异于西方文明系统中认为神创造了万物的宇宙观。

冯友兰先生认为，以阴阳解释宇宙，虽然不免笼统，但总比以天帝鬼神来解释，要好得多。这也是春秋时代各种思潮中朝向人本主义、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关键性转变之一部分。

普鸣试图向我们揭示，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天人合一”思想，在源流上是如何形成的，《成神》一书的副标题“早期中国的宇宙论、祭祀与自我神化”便随之而来。

在一个自发产生的宇宙之中，既然我们之所在及所有，都非神的创造，那我们亦不必时时祈求神的垂怜施舍。“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大帝之居。”在《淮南子》中的这段论述，以隐喻的形式，将人的自我修习过程，描述成一趟不断向上攀登的登山之旅。从昆仑山开始，直达大帝之居，人每完成一个步骤，到达一个新的修行阶段，就获得更大的超自然能力，先是实现永生，继而呼风唤雨，最终成神，与大帝同居。简言之，道家相信每个普通人的生命之中，亦包含拟神的潜能，人不需要利用占卜或祭祀来讨好或操控神灵，相反，得道者直接成为神，并具有神之伟力。

普鸣说，他之所以选择“人神关系”作为研究中国的切入点，是因为主流学界皆认为，中国文化历来主张天人合一，但普鸣对此持怀疑态度。他认为，在青铜时代的中国，不仅不存在天人合一的观念预设，相反，人和神之间还处在一种相当紧张的关系张力之中。他以殷商时代为例，从一系列出土的占卜、卦辞中不难发现，在殷人的世界里，神灵和祖先喜怒无常，大自然恩威难测，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更像是一种角力和竞争关系：人试图从自然界和神明那里占得利益，同时人的生存和行为本身，也造成了对神的潜在惊扰。为了化解神的怒气，殷人举行祭祀，安抚祖先亡灵，这一过程，普鸣称之为“神灵的人格化”，即“拟人的神”。

这种情况到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改变，人们开始反对以控制神灵为目的的祭祀，转而强调个体修身的重要性。在普鸣看来，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标志性时刻，上文提及的《淮南子》就出现在这一时期，包括《国语·楚语下》《论语》《墨子》《管子·内业》等诸子典籍，都开始否定人与神互相分离、二元对立的预设，一个“关联性的宇宙”在中国人思想中开始成型。

“人和自然没有形成两个分离的领域，而是一个独一无二的社会”，在法国汉学家葛兰言眼里，中国人预设了一元论的宇宙。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公元前4世纪逐渐被创造出来，正是一批新兴的“士”，在当时的朝廷中显露头角，他们著书立说，反复批判祭祀和占卜的过程，也可视为与祭祀专家及巫师抢夺权力的过程。相信人皆可通过自我修习，实现内圣外王，乃至直通太一，“拟人的神”便渐渐让位，“人的拟神”开始登场。

微言达义